

## 《论衡》修辞技巧的运用

韩中华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王充《论衡》的修辞技巧,是后人略于论述的,且没有详细的探究。王充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修辞观,考察《论衡》的修辞艺术,它的譬喻的精妙通显,尤其是类比修辞对后世鉴赏的影响特别重大,它的对偶、排比与引用的运用增添了其文学色彩。《论衡》修辞技巧的运用彰显着汉代政论散文的成熟。

**关键词:**王充;《论衡》;修辞艺术;诸子散文;文学形式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1-0069-04

《论衡》在汉代作品当中,只是诸子散文中的一类,而从整体上来说,代表汉代文学作品最高水平的是汉大赋。《论衡》的确在文学高度上有欠缺,但是它的写作手法、风格特征反映了汉代散文的新风尚,是了解汉代散文、后世散文及其文学理论的重要环节,并且《论衡》的语言风格是其文学性的具体体现,是了解《论衡》文学风貌的必要参考。袁枚说:“古圣人以文明道,而不讳修词;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sup>[1]</sup>王充在《论衡》中非常认同圣人文章明道德的意义,并且反对无补教化的修饰之文,可是因为文体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受汉代大赋等文学形式骈俪化的影响,《论衡》行文亦有丰富的修辞。

### 一、譬喻的精妙通显

宋代杨文昌刊刻《论衡》序云:“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sup>[2]1314</sup>王充在《论衡》中不仅大量运用譬喻,而且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关于譬喻的观点、运用譬喻的方法以及评判标准。在譬喻的理论化进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如此,作为扩展式譬喻的类比修辞在《论衡》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对诸如《人物志》、《世说新语》在人物评鉴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说文》:“譬,谕也。从言俞声。”<sup>[3]</sup>这是“譬”的本义,它与现代修辞中的“比喻”可以等同。譬喻作为一种修辞方法在先秦时期已经为各家所熟知,从老子建立譬概念为肇端,经过孔子的“能近取譬”,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关于譬的理论化尝试、探索,至《墨辩》达到先秦关于譬认识的最高水平。东汉末年王符《潜夫论·释难》将“譬”、“喻”连文云:“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sup>[4]</sup>至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云:“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sup>[5]602</sup>譬喻之理论渐已完备,王充《论衡》所论即是在其中起承前启后作用。首先,王充以为运用譬喻的目的是“喻深以浅”、“喻难以易”,他说:“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贤圣铨材之所宜,故文能为深浅之差。”(《自纪篇》)<sup>[2]1194</sup>其次,王充认为运用譬喻的标准是“应事称实”。王充批评韩非子的“以鹿喻马”云:“夫韩子知以鹿、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韩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将听其言也。加冠于首而立于朝,受无益之服,增无益之仕,言与服相违,行与术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非韩篇》)<sup>[2]431-432</sup>王充认为:“夫比不应事未可谓喻;文不称实,未可谓是也。”(《物势篇》)<sup>[2]145</sup>“应事称实”既是譬喻的评判标准,也是其核心价值。

《论衡》中的譬喻运用不仅体现了王充的譬喻观,而且,其譬喻方法的运用不拘一格,有时单用一

收稿日期:2014-09-11

作者简介:韩中华(1990-),男,河南太康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种,有时是多种方法连用。比如,王充在论述文章内容与形式的比重关系时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土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后射中。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于心,其实一也。”<sup>[2]609</sup>这里,以根与叶分别喻文章内容与形式,在文中即是以借喻的方式呈现,而接下来以禽之毛喻人之文的明喻方式展开,再往下又拿射箭之事为喻,整体来看,则构成复杂的譬喻范式,不厌其详。熊礼汇评《论衡》散文特点时说,“博引众事,取譬用喻,反复论说”<sup>[6]</sup>,正是如此,这样既能详尽论述,但是也略有不够简净之弊,因为有些道理用一个精彩的譬喻既很充分也显得简明。《论衡》譬喻另一重要特点是喻体的常见、平实,这既与《论衡》文章的质朴风格相得益彰,又是王充追求的“求真实”而不刻意追求华丽之词的真切体现。《论衡·书解篇》:“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sup>[2]1149</sup>钱钟书评此说:“且举凤羽虎毛之五色纷纶为比。则隐身适成引目之具,自障偏有自彰之效,相反相成,同体歧用。”<sup>[7]</sup>《论衡》中一般的譬喻都是“同体歧用”,但也有另一种属于逻辑修辞的类比。

类比修辞是譬喻的另一种呈现方式,如果说比喻是把一样东西比作另一样东西,那么类比就是把具有同样特征的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比较。张隆溪评中国古代类比思想时说:“是在两个不同事物或情景当中找出对应关系的思想方法,所以基本上是一种联想或隐喻的思维方式。”<sup>[8]</sup>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sup>[9]</sup>此即为类比修辞的代表。《论衡·骨相篇》运用类比非常充分。首先,王充认为骨相可看的理念是“类同气钧,性体法相固自相似”,即同一类命的人所禀受的气相同,那么他们的天性、形体、骨法、相貌本来就是相似的。然而,王充的类比之中将其扩展为人与动物、器物之间的类比。文章开始说“黄帝龙颜,颡项戴午”、“皋陶马口,孔子反羽”,引出君王、圣贤之贵有骨相类同动物、器物。文章又说:“故知命之工,察骨体之证,睹富贵贫贱,犹人见盘盂之器,知所设用也。善器必用贵人,恶器必施贱者;尊鼎不在陪厕之侧,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贵之骨不遇贫贱之苦,贫贱之相不遭富贵之乐,亦犹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犹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过其量,物溢弃遗;爵过其差,死亡不存。论命者如比之于器,以察骨体之法,则命在于身形,定矣。”<sup>[2]120</sup>这是以器物的归属安置类比人的富贵吉凶,非常生动深刻,更富有趣味的是操行也能“骨相”:

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见命之表证,不见性之符验也。范蠡去越,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子何不去?”大夫种不能去,称病不朝,赐剑而死。大梁人尉繚说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计,始皇从其册,与之亢礼,衣服饮食与之齐同。繚曰:“秦王为人,隆准长目,鸷膺豺声,少恩,虎视狼心。居约易以下人,得志亦轻视人。我布衣也,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须得志,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见性行之证,而以定处来事之实,实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系于形体,明矣。<sup>[2]120-123</sup>

文章将越王比作“长颈鸟喙”之人,将秦王比作豺狼之人,是因为这人的性命类同这些动物,而这些动物的特性为人熟知,所以论述就显得明晰、深刻,也富有趣味性。这里有一个问题,王充用类比修辞观人,为什么不譬于山水树木,而但从动物、器物作喻呢?

魏时刘劭《人物志》是专门品鉴人物的,整体上以人之筋、骨、血、气、肌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应,而呈显出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等特质。此“五质”又分别象征“五常”仁、义、礼、智、信,表现为“五德”。《人物志》在具体论述中运用类比并不多,而仅有的几处,如《人物志·才能》云:“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sup>[10]</sup>依然用器物作类比。然而,这里即可看出《人物志》与《论衡》的异同,《论衡》依然保留天人合一的痕迹,而《人物志》几乎没有;《论衡》更着眼

于人性,而《人物志》则更看重风韵。《人物志》受魏时“九品中正”等察举制度的影响,品鉴人物更加正统。至于到了南朝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则是另一番丰富的类比美景了。如《世说新语·赏誉》云:“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又有:“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这里以山川植物为比,形象生动地概括出人物的特征。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类比从动物、器物扩展到山川、植物,而且对人物的品鉴又着眼于人格风尚。如此看来,最初品鉴人物并非从山水观照,而是由动物类属以观人的性灵,从善恶伦理角度审视之。

王充对譬喻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系统的认识,在《论衡》一文中运用得非常充分,它能够用具体的事物来说明抽象的事理,更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譬喻的变化多端的运用,起到非常鲜明的效果。其中,类比的运用既有利于文章的清楚表述,又对后世文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类比修辞的视角来看,品评人“性”是对人自身风韵的观照,由观人性而观风韵,到确定一种人格美,这是汉末魏晋时代风尚的发展。

## 二、对偶、排比与引用

《论衡》除譬喻外,运用的修辞手法很多。《论衡》对偶的骈俪化倾向不是王充的本意,却无形中带有两汉之际行文风尚;排比的铺陈罗列使文章句式整齐、富有气势;引用的沉冥巨富对于《论衡》语言繁博风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这些修辞浑融于《论衡》文本当中,既有利于论述明理,又增添了《论衡》的文学色彩。

《论衡》对偶的显著特点就是散借骈形。古代散文的写作是不讲究对偶的,并以此与骈文区别,王充是反对过分注重丽辞的,可是《论衡》的语言却不自觉地有骈偶化的倾向。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篇云:“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之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又以事对,各有反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sup>[5]588-589</sup>刘勰举出言对、事对、正对和反对四种,并以为事对、反对为优。《论衡》中的对偶多是反对,如“日朝出而暮入,非能求之也,天道自然”(《命禄篇》)、“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逢遇》),既有前者的句中之对,又有后者的句间之偶。刘师培说:“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sup>[1]</sup>东汉中期时文章已明显出现骈化,《论衡》具有这样的对偶是与两汉之际的文风大趋势有关的。

《论衡》的排比呈现出铺陈罗列的特点,而且多与对偶相结合。《幸偶篇》云:

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猎者张罗,百兽群扰,或得或失;渔者罾江湖之鱼,或存或亡;或奸盗大辟而不知,或罚赎小罪而发觉;灾气加人,民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

夫百草之类,皆有补益。遭医人采掇,成为良药;或遗枯泽,为火所烁。等之金也,或为剑戟,或为锋铍。同之木也,或梁于宫,或柱于桥。俱之火也,或烁脂烛,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涂轩户。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恶同,遭为人用,其不幸偶,犹可伤痛,况含精气之徒乎!<sup>[2]38-42</sup>

一篇之中有如此大段的排比与对偶的交相配合,既增强了文章气势,又使句子整齐美观。同样,这样的修辞手法的运用依然与诸如汉大赋的文学艺术紧密相联。

《论衡》的另一个重要的修辞特色是引用的沉冥。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sup>[5]614</sup>《论衡》通篇一个重要的引用就是“孔子曰”,近乎拜辞之多,几乎篇篇皆有。王充引此有几个目的,一则引出论题,二则增强论据力量,三则引出以为批判。由此可见,虽然王充“问孔”,但他依然是辩证地对待孔子学说的。对于孔子本人,王充将他列入圣人,也是表明他对孔子的极其尊重。《论衡》引用

其他人的话大抵是包含在这几个方面。《论衡》在引用典籍时大抵遵照原文,间隙偶有删改。林纾说:“须知为骈文者,不能不用渔猎;散文中一着古书成句,即方望溪所谓生入古人句法,为大病痛,文体即欠严净。散文用事,当如水中着盐,但存盐味,不见盐质。”<sup>[12]</sup>王充着古书成句沉冥,即使化用,依然艰涩。《论衡》对于夸张的态度为人诟病,以为其磨灭了作品的文学色彩,而王充是“疾虚妄”以“求真美”。对此,王充的确矫枉过正。《论衡》无论骈俪化的倾向、排比的铺陈罗列、引用的沉冥巨富,都是为了明理求真,《论衡》这样的修辞手法的运用也都有将感情事义化的趋势。

### 三、结语

王充处在两汉政权更替初期,受当时虚妄世风、谶纬学风的刺激,他作《论衡》以“疾虚妄”、“求真美”,所以《论衡》所作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为了明理,也为了自荐。那么,《论衡》所运用的修辞也都是为论辩服务的,这是其修辞艺术运用的基础,是其在运用譬喻时选择普遍喻体的原因,也是其在运用其他修辞手法时注重士人为论说对象的原因。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汉魏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对文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比如,自东汉时期开始的翻译佛典所广泛运用的譬喻艺术为当时士大夫所吸收。曹操《短歌行》中的“譬如朝露”即是借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中的“犹如朝露”,曹植七步诗中也是运用此法。这种譬喻修辞艺术主要受中国本土文学的影响,当然也接受了外来文化的熏染。王充的修辞观及其在《论衡》中运用的修辞艺术对后世文学批评及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魏晋时期文学理论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1]袁枚.袁枚全集[M].王英志,校点.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198.
- [2]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3]许慎.说文解字[M].长沙:岳麓书社,2006:51.
- [4]王符.潜夫论笺校正[M].彭铎,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326.
- [5]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02.
- [6]熊礼汇.先唐散文艺术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350.
- [7]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0.
- [8]张隆溪.一粟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59.
- [9]孟轲.孟子译注[M].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278.
- [10]刘劭.人物志译注[M].柏原,译注.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73.
- [1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16-117.
- [12]林纾.春觉斋论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44.

## The Use of *Lun Heng's* Rhetorical Skills

Han Zhonghua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Lun Heng's* rhetoric skills was slightly by posterity, and there is no detailed inquiry. Wang Chong already had a clear view of rhetoric. Reviewing the rhetorical skills of *Lun Heng*, the wonderful aspect of metaphor, especially the analogy rhetoric major analogy rhetoric to appreciate the impact of future generations. The use of duality, parallelism and references adds to its literary. The use of *Lun Heng's* rhetorical skills shows the mature of Han Dynasty political prose.

**Key words:** Wang Chong; *Lun Heng*; rhetoric; Zhuzi prose; literary form

(责任编辑 王作)